

荆楚营随感

陳玥 江漢關博物館文博館員

离开学校数年后，2017年8月参加第七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的12天，可谓是对智力和体力的一次挑战。近十年后，2008年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上的激烈的争吵，仿佛再次回到眼前。不同的是，参与者的学术兴趣更为广博，课程安排也超越了明清历史的范畴。众多来自文学、哲学、考古、上古史、古文字领域的青年学者，带来更大的文化冲击。在此之前完全难以想象，分组讨论中彼此理解并进行有效交流的难度。

此次研习营的课程及田野考察安排围绕“荆楚文化”展开，王汎森、王明珂两位“中央研究院”院士第一天讲座的题目，分别是“明清两湖一带的思想活动”和“盘瓠子孙记忆”。乍看上去讲的是具体的题目，但却带出本次研习营被反复拿出来讨论的重要问题和方法：“流动”——荆楚文化内部差异性及其地方性根源，以及史料的文本分析方法。接下来的田野考察，钟祥元佑宫、明显陵，樊城米公祠、山陕会馆，襄阳城，武当山玉虚宫、泰山庙，一路向鄂西北而行进。通过元佑宫、米公祠、山陕会馆中的碑文、铭刻，明清时期地方人群随着战乱流离、地方社会商业网络的流动性等问题逐步清晰的浮现出来，引发学员们激烈的讨论。在郑振满等老师的带领下，学员们现场读碑、抄碑的热情高涨，相信不分专业，不少人都会留下“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的习惯。回到武汉以后，“中研院”文哲所的胡晓真老师用《荣美纪游》将大家带入另一种文本解读的语境中，武大的杨国安老师则用自己在鄂东南地区的田野经验，展现了该地宗族社会明清以降的状态。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南截然不同的“地方性”就这样展现在学员们面前。

研习营第二天来自台北故宫的邓淑萍老师以湖北出土的两周玉器为对象，讨论了华东、华西两种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类型在时空上如何彼此交替，及其对楚地考古文化的影响。她与另一位讲师，武大考古学教授余西云当天的隔空对话，将大家的思路扩展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中。从武当山下来，在随州参观了擂鼓墩曾侯乙墓地发掘遗址，听省考古所研究员叶家山遗址发掘领队黄凤春老师做了“曾侯之谜”的报告，并进入整理库房近距离接触了叶家山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回到武汉后，又听了余西云老师以陶鬲的为主要对象分析江汉地区考古文化谱系演变的讲座。这些讲座在专业研究者眼中，自然充满了学术冲击力。但对像我这样非专精于此的学者而言，由玉器、青铜以及陶鬲表现出的不同特性，思考背后的社会阶层性问题，似乎更为有趣。

同样存在阶层性，并引人深入思考的还有宗教问题。武当山的道教活动在明清之际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带着这个认识回到课堂；陈伟老师分析了楚简中的神祇谱系，李丰懋、刘苑如两位老师分析了谶纬在刘宋、李唐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田野与文献仿佛都应证了郑振满老师那句“宗教是最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然而郑老师讲这句话的时候，举得的例子却是与宗族、商会等活动杂糅在一起的民间宗教仪式活动。在王汎森老师讨论过的“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对日常生活中的仪式，不同参与者，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这次研习营正如这样一场仪式，我相信不同专业背景的参与者，会有不同的感触与收获。对我自己而言，本来如鄂东南、鄂西北、鄂西南的地域差异这样的问题，是无需思考背后根源的常识问题；所谓“荆楚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构建出来的概念。但站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中，重新审视上述区域差异，就不得不重新思考这种地域差异对区域内外城市功能、分布、规模，乃至文化的影响。之前由社会经济史入手研究城市，总是极力避免碰触文化或其他类似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进入历史时期，文化是一个与考古学文化截然不同的概念，不仅研究对象截然不同，而且不同地域、阶层的话语权问题也凸显了出来。然而，先跳脱出史学研究的立场，将自己放在博物馆馆员的身份上思考如何解读与呈现文化的问题；然后再回到史学研究的立场上：所谓文化分析，其实分析的还是背后的承载者。而研习营中来自不同领域的师生，之所以有兴趣一起研讨，也正在于大家的学术兴趣最终都可以归结到人的思想和行为上。

做学问不容易，问学之路既孤寂又漫长。比起在研习中了解各专业不同的研究方法、解决学术困惑、发掘新的学术问题，研习营更大的作用大概是让年轻的求学者能够与同道接触交流：不自觉孤单，方能砥砺前行。

最后要再次向组织、参与以及为此次活动付出辛劳的各位师长同仁、有关工作人员，以及各资助机构，表示由衷的感谢。